

杭州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

汪欢欢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2019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出台关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专项实施意见，凸显了两者融合的重要性。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是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极为重要的一环，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探寻杭州在大力实施“新制造业计划”背景下，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实现路径。

一、杭州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现状及短板

当前，杭州已探索形成了从“机器换人”“工厂物联网”到“ET工业大脑”“企业上云”的智造之路，制造业企业正加快向“网络驱动”“数据驱动”等新制造模式转型，如娃哈哈集团、华立集团等项目已被列入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中控技术、传化集团等项目被列入国家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万向集团、中电海康集团等企业入选了国家制造业“双创”平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向融合发展升级。但要真正实现其深度融合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

（一）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仍然偏小

近年来，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六大行业为主体的杭州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张，增加值由2015年的3154.11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6001.64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由2015年的53.9%提升至2019年的59.0%。但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规模和体量仍然偏小，如上海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2059.09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65.8%；广州在2018年生产性服务业就已经实现增加值9038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58.5%。

（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均

1. 科技研发服务供给不足

杭州在人工智能、光电芯片、生物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硬技术领域创新资源有限，创新能力欠佳，科技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在这点上与深圳相比差距明显。2019年杭州R&D经费内部支出530.4亿元，仅占深圳的39.9%；发明专利授权数11748件，仅占深圳的45.0%；PCT国际专利由2017年的564件、2018年的768件增长至2019年的1106件，但主要集中在阿里巴巴，其他制造业企业较少，而2019年深圳达1.75万件，并在智能制造业增势明显。科技研发服务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杭州实施“新制造业计划”的关键因素。

2. 物流服务供给问题突出

据2019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发布的首份全国重点城市物流绩效第三方评价报告显示，杭州仅排第

11 位，落后于重庆、上海、北京、武汉、深圳、广州、厦门、苏州、南京、大连。在众多物流运输方式中，杭州铁路货运尤其发展较弱，2018 年货运量仅相当于南京的 20.7%、宁波的 11.3%、广州的 15.4%、西安的 26.2%和成都的 46.2%。同时，物流业“低小散”和贡献度低的现象仍然存在，如钱塘新区物流企业多达 125 家，数量占服务业（不含贸易类）企业总数近一半，但其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 5.2%。

3. 高端商务服务供给欠缺

从集聚整合高端资源的总部经济来看，杭州本土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较少，2019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中杭州企业占据 4 席，而北京上榜企业 56 家、上海 7 家、深圳 7 家。跨国公司总部选择落户杭州的则更少，这与杭州历来受上海影响比较大有关，上海是多数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区域首选投资区位。同时，知识密集型的法律、会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等商务服务业规模较小。根据各城市目前公开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18 年杭州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收 2310.25 亿元，只占上海同期的 18.9%、北京的 19.6%、深圳的 71.0%和广州的 74.5%。

（三）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拉力不强

一是传统制造业的服务需求不足。当前，杭州传统企业数字化改造进程还不够快，尤其是食品、化纤两大行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低于平均水平，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的意愿也不强。纺织等传统产业融合品牌、文化、设计、时尚等要素的跨界发展滞后。同时，在受到印染配套产业外迁“断链”的影响下，进行产业服务化提升迫在眉睫。二是制造业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仍然缓慢。2019 年，杭州规上工业增加值为 3531 亿元，与深圳的 9166 亿元、苏州的 7592 亿元和广州的 4583 亿元相比有较大差距；体现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杭州仅为 25.0%，低于深圳的 68.1%、苏州的 38.7%和成都的 39.6%。

（四）两业协同集聚程度不深

近年来，杭州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引领，规划建设城西科创大走廊、城东智造大走廊，打造了一批省市级特色小镇、众创空间、孵化器产业平台。但总体看来，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相对独立，产业关联度较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还不够深。以钱塘新区为例，2019 年全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324.7 亿元，占 GDP 比重仅为 29.5%，而且服务业产出主要由批发零售业贡献，产业链上下游配套的研发设计、创业孵化、科技中介、技术转移、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其中，软件信息服务、研发设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规上企业分别仅有 19 家、19 家和 7 家，实现营收分别占服务业总营收的比重仅为 2.2%、1%和 0.6%。

二、促进杭州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对策思考

近期，国内城市纷纷在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领域进行战略部署，如上海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为着力点，全力打响“上海服务”品牌；广州重点发展个性化定制、信息服务、工业互联网、工业设计、工业电子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领域，打造引领全国的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苏州积极布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既着眼“新苏州制造”，又提出打造“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在此大背景下，杭州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迫在眉睫。

（一）增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扩大软件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和数字贸易等优势领域

一是围绕杭州建设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目标，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高端软件、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开展工业操作系统、实时数据库、工业中间件、工业应用软件等基础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培育一批自主研发实力强、市

2. 补齐科技研发、物流和商务等服务领域短板

3. 抢占检验检测认证、节能环保和人力资源等新兴服务领域

（二）挖掘制造业服务需求，推进融合创新试点示范

2. 培育扶持领军企业

（三）建设物理与数字集聚双平台，提高产业创新能力

1. 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物理布局

一是在钱塘新区等产业园区，以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为导向，探索新型产业用地（M0）的推广应用，并建设综合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二是在城西科创大走廊、双创示范基地等区域，建设一批软件与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等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三是在钱塘江金融港湾、特色小镇和城区楼宇等，建设一批金融科技、高端商务及总部经济、创意设计等特色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四是培育集制造业、服务业、高校科研机构为一体的创新体系，搭建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进相关融合成果转化。

2. 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

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搭建数字集聚平台，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集聚创新能力。一是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示范应用，建设面向异构网络互联互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并制定杭州工业互联网相关标准。二是加强工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及示范应用，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制造全业务流程的工业大数据平台，深化大数据采集分析、远程运维等服务型制造新模式应用。三是加强工业云服务平台建设及示范应用，推广万向、娃哈哈、吉利等企业智能化制造改造和恒逸、中策等数据化流程改造模式，深化“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建设设与与应应用用。。

（四）深化政策创新，调动市场主体能动性

1. 破除各类显性隐性障碍

适度放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相关许可证制度，打破不利于两者融合的有形无形行政性垄断和区域壁垒，吸引社会资本发展专业化、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加强业务准入管理的动态调整，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中对新技术、新业态留下包容空间，推行告知承诺制。规范各类前置审批和事中事后管理事项，明确保留事项的审批主体、要件、程序和时限，并向社会公开。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继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纠正各种形式限制、歧视和排斥竞争的行为。

2. 消除政策壁垒

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主辅分离，放宽制造业企业、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务的准入门槛，探索以主营许可等方式解决跨行业经营的资质问题。支持制造企业在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利用存量土地与房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因地制宜出台支持政策，积极盘活闲置的工业厂房、企业库房和物流设施等资源，并对办公用房、水电等给予补助，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领域的创业者提供低成本、高效便捷的专业服务与一流的营商环境。

3. 创新监管方式方法

积极在多元治理、分类监管、柔性执法等领域开展探索创新。强化企业底线思维和信用意识建设，对跨界融合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探索试行部门协同监管制度，完善监管制度建设的快速响应和精准服务机制。加强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与监管业务的全面融合，探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杭州“数字治理”路径。